

---

# 评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马仲廉

---

近些年来，大陆学者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比较重视。新近出版的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一书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这是毫不奇怪的。阅读马著后，我想写点评论，与作者和学术界交流。鉴于本书采取了“大写意”的手法，我的评论也只能是在大的方面议论议论而已。

此书是新颖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导论》中首先介绍了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状况，并说：“大陆史学界关于正面战场研究目前尚处在初创与起步阶段。”“台湾史学界过去虽然在这一方面做过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受政治等因素的局限与束缚，整个研究仍存在一些弊端。”作者对当前我国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状况的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鉴于此，作者为改变这种局面，力图在宏观上对整个正面战场进行“整体战略的考察”，在微观上对各主要战役进行“战略背景性因果关系总体分析”。此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传统的战争史编写的方法，大致采用按战前形势，作战计划，军队部署，作战经过，战果及意义，经验总结顺序叙述的固定模式，此书边述边论，不拘一格，有的地方首先提出问题并表明自己的论点，再以史实论证。这种写法给人以活泼新鲜的感觉。

更为新颖的是，此书对抗日战争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不同于一般的观点。诸如，关于抗日战争分期，八一三上海抗战，台儿庄

战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诸战役，及远征军、驻印军在缅北和滇西的作战，还有关于战略反攻问题等。对这些问题，作者利用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有利条件，使用了馆藏档案资料，还阅读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抗日战争的大量论著，并加以提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当然，此书中的观点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我作为一个抗日战争的研究工作者，想对此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一、关于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

此书对已往的“三阶段”、“二阶段”论和台湾学者魏汝霖先生的“八阶段”论，提出了不同看法，而认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应划分为六阶段。此书即是以六阶段来写作的。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应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阶段划分相一致，而这种划分，我以为应以战略阶段划分为准。那么，划分战略阶段的根据是什么？战略阶段，是根据战略形势的基本变化而划分的战争阶段。战略形势的变化，就是构成战争的基本表现形式——进攻或防御的变化。就是说，一场战争如果划分阶段的话，不论战争的哪一方，都应按照自己一方处于进攻或防御来划分战略阶段。这就是划分战略阶段（战争的历史分期）的根据。

战争的敌对双方，实行进攻或防御及变化的过程，是由敌对双方根据客观环境与主观能力的优劣而决定的，由此产生了战争进程的阶段性。有的战争一个阶段就完结了，有的战争则需要二个三个或更多的阶段才能结束。例如，1895 年的意阿战争，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防御失败；1905 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一个阶段就结束了。中国的北伐战争，也只有一个阶段。近 30 年来的中印、中越边界战争和近年来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战争，也都是一个阶段的进程就结束的。由两个阶段结束战争的，如中国古代的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法俄战争开始时，拿破仑指挥法军进攻，俄军退却；后来俄军反攻，法军退却，也是以两个阶段战争结束的。中国解放战争也只有两个战略阶段，即以 1947

年7至9月为界，敌我双方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互换阶段。至于解放军在战略进攻后期，出现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两个阶段，这是为了突出战略决战的重要意义和追击残余国民党军的内容而划分的。实际上战略决战和追击都属于战略进攻的范围。三阶段的战争大多表现在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然后出现一段较长时间的双方战略相持，最后原防御一方展开反攻（进攻），另一方转入防御或退却。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是如此。

战略阶段的划分中，进攻一方的变化是主要的，因为敌对双方是一对矛盾，没有一方的进攻，就没有另一方的防御，反之也是如此。比如说，一方已经停止了战略进攻，另一方的战略防御也随之停止了。至于战略攻、防停止以后，战争仍然以其别的形式继续发展，这时所发生的战役、战斗应该划分在新的另一阶段中去。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中国军队当然也随之停止了战略防御，而转入与日军的战略相持。战略相持是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之间，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转换消长的阶段，其时间长短，决定于双方力量消长的快慢程度。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一方由进攻转入防御或退却，另一方由防御转入进攻或反攻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对双方都没有能力发动战略进攻或反攻，但战役攻、防则是不断的（这也是战斗力消长的一种方式），甚至出现战略性攻、防的战役。如1940年华北八路军的百团大战；1944年至1945年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和在此期间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战役。但是，只要敌对双方力量的消长尚无哪一方能够发动战略进攻（反攻），这种战略上的相持局面就没有被打破，战略相持阶段就依然存在。在此期间发生的军事行动，都未脱出相持阶段的范围。战略阶段的划分，还必须考虑到全局。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初期即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部分，敌后战场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此书《导论》中所说的：“敌后战场的开辟是我国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与正面战场

的关系是共存互依，相辅相成的。”因此，正面战场的阶段划分，不能不考虑敌后战场的战局发展变化。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阶段划分，应根据中、日双方战略形势的基本变化，即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攻、防的变化而决定。战争既然是敌对双方共同进行的，那么正面战场的阶段划分必须考虑到日本方面战略方针的变化，同时还要考虑到敌后战场的局势变化。“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第10页），因此，正面战场的阶段划分应与全国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取得一致。

根据上述观点，中国的抗日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的三阶段划分是科学的、正确的，战争的实际也是沿着三阶段发展的。但由于在战争后期出现了国际形势骤变的战争局势，中国战场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阶段未能实现，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是两个阶段，即日军的战略进攻，我军的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日两军的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至于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出现的战局变化，仍未脱出战略相持阶段总的范围。如因时间较长，为便于阐述，在相持阶段中再分几个小的阶段（如前期、后期）当然也是可以的。

按照上述观点，《惨胜》一书中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划分为六个阶段，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 二、关于正面战场的历次战役。

此书对于正面战场历次重大战役的成败作了剖析，有不少地方吸收了已往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这是此书显著的特点。

卢沟桥事变与平津之战，此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指出了此役失败的原因是“中方仓促应战，抵抗不力”，并归纳了3条失败的教训，即：冀察当局执行了错误的方针；内部发生矛盾与分歧和中方坐以待毙；作战期间指挥混乱，部队各自为战，有的按兵不动等。这些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得出的正确结论。

对日军占领平、津后，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此书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加以论述。在华北战场，作者对于第二战区山西抗战进行

分析并给予肯定的评论，认为“从战略上说是成功的”。作者对于阎锡山在这一阶段领导山西抗战也给予肯定和赞扬，并说明了不论中央军、晋军、川军，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协力抗战，体现了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但该书在论述华北抗战时，只有第二战区的作战，而对于作为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企图同中国军队决战的河北方面的作战，以及第一、六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抵抗和败退，却一字未提，这不能不说这是此书的一个缺陷。此书论述南战场淞沪战役，主要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关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动淞沪战役的目的，此书说是为“使日军分散兵力和改变侵华路线”，“吸引日军主力从北方南下，改变其侵华战线由自北而南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意图”。（第6页）此书在介绍淞沪战役的过程时说：“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张治中发动总攻击，意图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拒敌登陆’的作战计划。”书中引虞奇著《抗日战争简史》一段话，有“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的字样。这都不能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发动淞沪战役有改变日军侵华战线的意图。此书还引8月20日陈诚对蒋介石谈话，陈建议扩大沪事牵制华北日军，陈的建议得到蒋的肯定。这里要顺便指出一个问题，作者在运用资料时为何不用8月20日大本营颁发的第一、二号训令，即《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及《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训令稿》？这些文件是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其内容与虞奇在《抗日战争简史》中所说的作战方针并不一致。所以，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发动淞沪战役时即有改变日军侵华战线的意图，根据尚感不足。至于南京保卫战是蒋介石吸引日军到南京的“疑兵之计”的说法，我觉得有点荒谬。从日军方面来说，在占领上海以后乘胜夺取中国首都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重大胜利，而且很有可能压迫蒋介石屈服。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日军怎么能够“停止前进”呢？

此书对于徐州会战没有全面阐述，只提出了几个问题表明作者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完善的一面。本文因

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评论。只提出一点，关于徐州会战中“弃战撤退”问题。60万大军集结在徐州地区，在日军由南北两方面形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时，及时放弃决战计划，分路突围，并突围成功，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作为中央及战区指挥者，对于日军集中主力南北对进围攻徐州的企图本来就有预见，何况当时日军的行动也十分明显，在此情况下，集中大军在徐州与日军决战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不能以徐州60万大军顺利突围撤退，掩盖领导者决策的错误。日军占领徐州后，对突围撤退的中国军队实施追击，直至花园口炸堤日军受阻为止，至此徐州会战才算结束。此书将日军占领徐州后的追击作战，说成是日军统帅部计划以此行动进攻武汉（187页），根据不足。对于花园口决堤问题，此书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进行考察，给予客观的评价，肯定了此举在军事上的价值。但是书中说：“黄河决堤在客观上达成了阻敌西进袭扰我西北、西南抗战基地的效果，同时对保证我方抗日战略路线的实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1页）这似乎评价过高了。且不说日军占领徐州后有无沿陇海线西进部队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从作战过程分析，经过徐州会战的日军必须有一段休整时间，才能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在徐州会战中未受损失的60万中国大军尚在，武汉地区还有未参战的部队集结。在这样情况下，日军对武汉的进攻必须投入更多的部队，仅以进攻徐州的师团直下武汉是有困难的。日军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即便占领郑州，也不敢接着冒然孤军南下直取武汉。当然历史没有这样发展，这里仅是从军事学术和一般的作战规律所作的经验之谈。

该书对武汉会战进行了概括的比较正确的论述。

此书对于相持阶段中的各次重大战役作了概括的阐述。其中对第一次长沙战役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湘北大捷’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224页）作者根据实际作战情况，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如果说还有差别的话，那只是在各阶段、各

地方的‘积极’倾向不同。”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关于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以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定论，也否定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是为了对日投降的说法。作者认为国民党消极抵抗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总结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我军的战斗状况，可以说是毁誉掺杂，功过相半。”（247页）“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正面战场我军的战斗状况功过相半”，这种“半斤八两”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此书以一章篇幅论述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的作战，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评价；对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原因也作了分析，这些论述是正确的。

### 三、关于正面战场有无战略反攻的问题。

此书以史实为依据，明确指出：“严格地说，国民政府提出了‘反攻’战略号召，并无确实可行的‘反攻’战略计划与行动。”据史著载，1945年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曾策定了一个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塔计划”），决定在是年秋天对中国大陆的日军实施总反攻。但该计划的主旨是：“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sup>①</sup>可见，这仍是一个局部反攻计划，不是“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的战略反攻计划。因此作者关于国民政府“并无确实可行的反攻战略计划与行动”的结论，应该说是正确的。当然，如果改为：“严格地说，国民政府提出了‘反攻’的战略号召，也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白塔’的总反攻计划，但从这个计划的主旨来看，并不是确实可行的战略反攻计划，而且也没有全战区的反攻行动。”这样，是否更为准确一点？

关于各个战役中的具体问题，因为该书采取“人无我有，人详我略”，“一般不叙述具体作战经过”的方法，所以很难对那些本来

<sup>①</sup> 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第9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10月初版，第366页。

就写得不完整的战役加以评论。就此书已经写到的内容来看，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但限于篇幅，权且以“大写意”的方法，略而不提了。

#### 四，写作方法。

此书的写作方法的确新颖。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在历史著作的编写方面也应如此，作者应选择适合内容的最佳表现形式。我十分赞赏在史学方面的文稿，能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结合此书的写作方法，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像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样的战争史，究竟用何种形式反映为最佳？下面对此书的写作方法加以研究。

作者在《导论》中说：“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是抗战正面战场，是从纯军事角度来研究抗战，即就战争而论战争，而不是从政治、政略及外交关系等角度来研究抗战。”我认为这种就战争论战争的方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又说：“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sup>①</sup>茅家琦教授在《序》中说，该书是“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这是对此书写作方法的总概括。“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当然是属于政治的范围，而不是“纯军事”的。不管作者怎样说，此书仍是按此原则编写的。由于没有全面系统的反映战争过程，所以阅读此书以后有一种感觉：这不是一部战争史，而倒像一部军事、政治掺杂在一起的斗争史。

此书作者坚持“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按此原则，此书当然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对当前国内外广大读者来说，更需要的是一部新颖的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史（包括正面战场的战争史）。如果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479页。

此书以目前书中提出的新观点并全面系统地写正面战场，采取“人无我有（不漏掉重大历史事实），详略适中”的原则，就会给此书增添“丰腴感”，就会成为一个英俊健壮的青年，而不是缺胳膊少腿的“残废”。

此书“除必要者外，一般不叙述各战役的具体作战过程，而采用‘跳出圈外’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般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作到‘老调新弹’。”（第3页，茅家琦《序》）此书完全贯彻了这一写作原则，这是该书的特点和优点。但“写战役不写作战过程”，这怎么能叫战役？只能说是不完全的战役。作战过程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大的战役，情况瞬息万变。战役指挥者正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或修正原来的作战方案，以适应新的情况，争取作战的胜利。作战过程可以说是战役的主体，没有主体怎么能看出战役的全貌，没有对战役全面的反映，怎么能证明对战役的结论是正确的呢？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书以“大写意”的手法勾画了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给人以思考，给人以教育和启迪。感谢这位青年学者给我们送来了这份新鲜的精神食粮。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一幅壮丽的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对于这样一幅画卷，以“写意”的手法表现是可以的。但广大读者不仅要看到“写意”画，更需要看到“工笔”画。我希望此书作者在这部“大写意”的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出精雕细刻的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我认为作者才刚露头角，潜力是很大的，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